

# 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

张 翼

**【摘 要】** 文章通过对夫妇职业地位和教育获得状况的分时段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婚姻安排过程中存在的“门当户对”式阶层内婚制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继续延展。随着公有制的建立,虽然一度消解了基于财产占有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差别,但基于职业和教育等级而新生的阶层地位等级,却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婚姻选择。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对象,都在自己所属的阶层或与自己所属阶层等级地位临近的阶层。

**【关键词】** 阶层内婚制 代际传承 教育 职业

**【作 者】** 张 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阶层内婚制,是指在择偶过程中,人们基本遵循在同一阶级或阶层内部选择配偶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制度化”和日常操作程式化,使婚姻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维持既定社会结构的行为,即一方面鼓励上层阶级或阶层的青年男女只在本阶级或阶层内部寻找配偶,另外一方面也给下层阶级(阶层)在婚姻选择中对上层阶级(阶层)的“攀附行为”予以歧视性理解。毕竟,在传统社会中,上层阶级(阶层)经常有意无意地设置着各种“壁垒”以限制下层社会成员的婚姻进入。因为较高一个等级的阶级,只鼓励本阶级(阶层)成员之间成婚,将女儿出嫁给本阶级(阶层)或较本阶级(阶层)等级为高的那一阶级(阶层)的适婚男性,而限制、禁止和打击那些允许自己的女儿与比自己社会地位更低的阶级(阶层)缔结婚姻的做法。在男权社会中,如果一夫多妻制被允许,那么,妻往往是本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妾则可以从下层社会购得或娶得。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阶层内婚制,表现为一种典型的“门当户对”。在婚姻不能自主的时期,子女的婚姻选择权,掌握在父母手中,父母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与之联姻家庭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在社会流动率极其有限的前提下,借之于媒妁之言式门当户对的姻缘安排,就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择偶模式。事实上,如果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将男女之间婚姻的缔结看做是部族之间“女人的交换”,那么,婚姻的“门当户对”,或者说同一阶级阶层内部家庭之间婚姻的交换,就表征着地位对等交换的达成(马克·赫特尔,1988:149)。从理论上讲,包办婚姻的实质,就是在择偶过程中强调婚姻当事人的社会地位,而对作为新娘和新郎的未来身份与爱情置之不理。

阶层内婚制的维持,一方面取决于民间社会所遵从的婚姻安排习惯,另一方面受国家婚姻制度的限制。比如清朝实行的“贱良不通婚”、“旗民不通婚”等,就是国家强制推行的婚姻准则。而为维护中上层阶级的所谓“婚嫁必论门户”的习俗,则是民间意义的择偶规约。郭松义(2000)在论述到这一点时,曾经引用某些地方县志的资料说:“男女议婚,大率以门楣为重,亦互择人”;“婚娶必择家世相当者”;“婚缘论门第,辨别上中下等”。可见当时门当户对之风的盛行。

在解释传统社会的阶层内婚制原因时,学者们主要考虑的是私有制下的家族资财管理和社会地位上的网络联姻。比如,古德在《爱情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中指出,允许青年男女以个人的意志自由恋

爱,会对既定的社会分层制度产生潜在威胁。尤其是当婚姻涉及两个亲属群体之间的关系时,或者在亲属网络构成一个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关系时,择偶就对社会结构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因此,与择偶联系密切的财产继承权、家庭控制权以及血统延续性等,就迫使家长干预或干脆决定子女的婚配(马克·赫特尔,1988:159)。以斯蒂芬斯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越是以扩大家庭或以单直系亲属家庭为主的社会,家长越趋向于包办子女的婚姻、或者家长会在保留其否决权的基础上允许子女选择自己的配偶;越是以核心家庭或双系亲属家庭为主的社会,越是允许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配偶。斯蒂芬斯总结说,“择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属关系影响人们婚配状况的趋向”:当较大的亲属群体权势显赫的时候,婚姻一般是亲属群体的事情,因为它要关注家庭的阶级利益(马克·赫特尔,1988:147)。这就是说,学者们所论述的阶层内婚制存在的前提主要有以下几点:(1)是否存在私有制与私有财产;(2)社会家庭形式,即非核心家庭在社会占据的比重大小;(3)父母亲或家长对子女的婚姻是否具有“包办”行为。

下面以这三点为尺度,看看中国的情况。从1949年到1976年,伴随公有化运动和计划经济的逐渐建立,中国基本消灭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结构,并以国家强权的方式将原有的阶级阶层秩序强制性倒置,使1949年之前的上层阶层,在专政下不得不处于社会底层。而与此同时,“土改”又确立了新阶级在新国家中的地位等级——依据人们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贫富程度和对革命的支持力度,在农村划定了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等,在城市划分出干部、工人、个体工商户、知识分子、小业主和资本家等,并使新中国成立前最贫困的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意识形态赋予最高社会地位。

宏观领域阶级结构的变化,在微观社会的家庭内部也导致了夫权观念的式微,“妇女也是半边天”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新《婚姻法》的颁布,男女平等、自由恋爱、“无产阶级爱情观和婚姻观”在国家强制力保护之下的贯彻等,都给妇女制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纪元(费正清,2000:331)。在这个前提下,婚姻自主和自由恋爱的观念开始被世人所接受,绝大多数青年男女的婚姻,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婚姻包办现象成为旧时代的代名词而转化为历史。

在婚姻自主的年代,爱情被解释为结婚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家庭形式,也开始逐渐核心化。中国家户的人口规模,尽管一度伴随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迅速增长而有所扩大,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贯彻,却使其快速减少。比如,自1953年到2000年所进行的五次人口普查可以看出,从“一普”到“五普”,中国家庭户规模依次为4.33、4.43、4.41、3.96和3.44人。依据“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的数据,1982年中国城市家庭的主要形式就已经转变为核心家庭(刘英等主编,1987:137);最近,中国农村的家庭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核心化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伴随工作重点向经济领域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多元化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成长为生产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经济多元化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个体户和业主阶层已经成长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阶层。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员工,也多多少少地染上了“小资情调”。“是否有钱”成为评价一个人是否事业成功的重要标准。改革前存在的所谓“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阶级结构,已经转变成新时期的多阶层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1)在经济阶级和财产阶级的社会分层机制被公有化运动消解之后,伴随家庭形式的逐步核心化与青年婚姻的自主化,人们的婚姻缔结过程,是打破了阶层内婚制,还是仍然维持着阶层内婚制?(2)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对阶层内婚制有什么显著影响?

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回答阶层内婚制是延续的,还是已经被历史所终结?或回答其是否先被历史所终结,而后又适应于新的形势而复生?

## 二、数据与变量介绍

### (一) 数据简介

为了对前面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笔者使用了2001年“社会结构变迁调查”的数据。该调查总共抽取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内蒙古、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四川和贵州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查,随机获得6193份访问个案,获得的样本基本能够代表全国的状况。从性别上看,在被访问者中,男性占52.4%,女性占47.6%;从年龄上看,出生于1930~1939年的占12.4%;1940~1949年占17.3%;1950~1959年占24.1%;1960~1969年占24.4%;1970~1979年占15.5%;1980年以后出生的占6.3%。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有配偶者”占84.2%。因此,从时间跨度和有偶状况上,可以分析婚姻双方的职业地位和教育地位。

### (二) 变量介绍

要准确回答阶层内婚制是否延续的问题,首先要对被访问者的社会阶层给予标定。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家庭阶级成分划分,实际上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前该家庭的财产占有状况和该家庭家长的政治倾向性而做出的。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土改”运动,基本上消除了地主对土地的绝对占有,但富农家庭的人均土地占有额仍然很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消除<sup>①</sup>;在城市,虽然没收了官僚资本,但民族资本家仍然经营着自己的企业、城市工商业者也维持着原来的财产占有状况,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城市的私有化状况才被公有化。即使如此,到“文化大革命”时为止,城市里的少数手工业者和个体工商户才基本被完全公有化。因此,在历史跨度中,家庭的阶级成分不能用于考察阶层内婚制状况。况且,“家庭阶级成分”实际上是人们出身家庭在解放初确定的成分,不能代表被访问个案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社会地位。

现在,以个人为研究单位划分阶层所属的方法有两类,一是以美国威斯康新学派的瑞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分类法,该划分方法仍然注重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实际占有的生产资料,并注意对权力资本或组织资产的评价(Wright, E. O., 1979);二是英国分层社会学大师冈索普的职业结构体系(Goldthorpe, J. H., 1987)。虽然冈索普自己认为他的职业结构体系着重考察人们在就业市场上的位置与劳动关系,而不是一个层级的或等级序列的体系,但很多人在借用冈索普的分层理论时,也将其作为序列变量来处理。因为不同的分类方法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社会学的学者们在评判人们的地位不平等和阶层差异时,大多从不同的角度多元借用前人的理论概念,即除了评判“职业阶层”外,还考察“教育阶层”和“收入阶层”之间的区别。

由于收入在不同社会制度和货币制度下很难被标准化,比如,被访问者1949年以前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收入,就很难被标准化,因此,在笔者暗含的理论假设具有时段比较的前提下,只好忍痛割爱。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主要考察“职业阶层”和“教育阶层”的阶层内婚制状况。

#### 1. 职业阶层——职业社会地位

一个人获得的职业等级,基本代表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经验研究取向的社会学家,往往将职业作为等级变量来处理。比如,林南与边燕杰(2002)在分析中国城市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时,就将“农业”、“商业”、“制造业”、“服务业”、“办公室工作”、“行政与管理”和“专业与技术工作”等作为序列变量来处理。

<sup>①</sup> 富农对土地的私人占有状况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为不同的特征。在1950年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尤其是在“新解放区”所进行的土改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很多地方富农的土地仍然维持了原来的状况。因此,在土改之后,地主家人均土地面积,基本上与贫雇农家庭的人均土地面积一样,而富农成为人均土地占有额最多的阶级。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所有制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后等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比例构成,笔者主要采纳冈索普的阶层分类框架。与林南和边燕杰不同的是,笔者认为中国的“行政与管理人员”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较之“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序列为高。毕竟,在再分配经济中,接近权力的人员,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易于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谋取更多的好处。因而,综合评价权力、收入、福利待遇、住房、工作自主性程度以及工作过程中的技术含量,笔者将中国的阶层主要定义为这样一个序列:(1)官员和私有业主阶层;(2)专业技术人员阶层;(3)办公室办事人员阶层;(4)商业服务业阶层;(5)采掘业和制造业阶层;(6)农村专业户阶层;(7)粮农阶层。由于调查以家户为单位抽取当时在家的被访问者为访问对象,忽略了流动人口。所以,缺少农民工的案例。

## 2. 教育阶层——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导致现代社会人们阶层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布劳—邓肯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受教育程度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Blau and Duncan, 1967)。在正常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所获得的初职职业地位和最终职业地位都比较高。另外,受教育程度还是一个近似地代表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家庭文化多少的变量,那些父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往往更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不仅能够使自己的孩子接受比较多的教育,而且还会让孩子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因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能够为自己的子女传承更多的教育资本,并通过子女教育资本的提高,提升其职业和阶级地位。

虽然学者们都对“教育阶层”以较多的关注,但在设定“教育阶层”指标时,却存在某些差异。有些研究人员所确定的“教育阶层”变量,往往是“受教育年限”,而不是“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指的是一个人在全日制学校或非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的年数(当然也包括接受职业培训的时间),但受教育程度却指的是一个人在全日制学校所取得“文凭”。在正常情况下,受教育年数应该与受教育程度相接近,但我们所考察的对象年龄在16~70岁之间,出生于不同的时代。而且,某些人填答的是“半工半读”学校的年限。这就为不同被访问者之间“受教育年限”的计量带来了不便。另外,中国的学制也经历过数次变化。就小学而言,有5年制也有6年制;就初中而言,有3年制也有2年制;高中的学制,也是有2年制和3年制。即使是在学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或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时段,各个大学“军训”时间长短的不同,也人为制造了被访问者“受教育年限”多少的差异;而另外一些特殊专业,如某些医学院的“中医专业”,就实行5年制的本科制度,这也造成在“全日制学校受教育年数”不同,而最后获得的“文凭”却相同的情形。所以,为了使不同年度和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被访问者有一个同样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准则来度量其“接受教育的状况”,笔者选择使用被访问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毕竟,文凭是一个固定的指标,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这一变量的赋值也越高。

## 3. 观察变量的历史时期

为考察阶层内婚制现象的延续程度,笔者将被访问者结婚年的历史观察期主要切割为4个时段:1965年以前的“文化大革命”前时期、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77~1991年的改革初期、1992年以后的改革中期。这样划分时段的主要目的,在于检视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所有制状况背景之下,是否存在“阶层内婚”程度的差异。

# 三、教育阶层内婚制的延续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极其显著的预测人们所处社会阶层的指标。一方面,越是工业化社会,人们越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去承担专业化工作;而另外一方面,为了补偿专业人员受教育年限较长的机会成本,社会不得不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员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教育阶

层与职业阶层一样,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人们的收入水平。

表1给我们详细报告了自己与配偶、自己与自己父母、以及自己与配偶父母之间的净相关系数。考察表1所反映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各有关人员之间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是正值,即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时候,与自己相关的这些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也就高;当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时候,与自己相关的这些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也就比较低。这就是说,在以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为纽带缔结的家庭网内部,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具有阶层同构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各对婚姻相对方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净相关系数表现得最高。考察表1可以看出,自己与“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之间、自己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之间、配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净相关系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段内,都表现得比较高。

第二,母家庭家长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正相关性。比如,自己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配偶父亲和配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之间,自己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配偶父亲、配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净相关系数都很显著,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这就是说,在自己父母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时候,自己配偶的父母也同样取得过较高的“文凭”。这是“亲家”与“亲家”之间教育阶层的同构性。

第三,自己与配偶父母之间,配偶与自己的父母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净相关系数也很显著。这是姻缘选择性作用的结果,具有较高“文凭”的父母,就要求自己的子女在择偶时,也注意“文凭”的价值,使子女与其配偶之间的受教育程度相同或临近。最极端地说,具有“博士”文凭的父母,绝不允许自己的子女选择一个文盲作为结婚对象。

第四,自己与自己父母之间、配偶与配偶的父母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净相关系数很显著。这是教育“文凭”的代际承传性在起作用,即接受过较好教育的父母,会创造各种不同的机会,促使自己的子女

表1 各相关人员教育阶层之间的净相关系数(分性别、分结婚年度)

	全部个案 N=4068	男性 N=2108	女性 N=1956	1940~1965 N=662	1966~1976 N=814	1977~1991 N=1811	1992~2001 N=758
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与							
配偶受教育程度	0.4964***	0.5724***	0.5280***	0.3544***	0.3697***	0.4491***	0.6064***
自己父亲受教育程度	0.3050***	0.3097***	0.3250***	0.2365***	0.1838***	0.2192***	0.3472***
自己母亲受教育程度	0.2758***	0.2409***	0.3295***	0.1470***	0.1062***	0.2077***	0.3084***
配偶父亲受教育程度	0.3050***	0.3357***	0.2867***	0.2163***	0.1250***	0.2371***	0.3276***
配偶母亲受教育程度	0.2780***	0.2805***	0.2765***	0.1813***	0.0837*	0.2217***	0.2918***
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与							
自己父亲受教育程度	0.3015***	0.3455***	0.2545***	0.2451***	0.2070***	0.2133***	0.2961***
自己母亲受教育程度	0.2713***	0.3031***	0.2421***	0.1188***	0.1176***	0.2037***	0.2807***
配偶父亲受教育程度	0.3546***	0.4173***	0.2988***	0.2291***	0.2096***	0.2982***	0.3603***
配偶母亲受教育程度	0.3028***	0.3599***	0.2623***	0.1336***	0.1114***	0.2521***	0.3271***
自己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							
自己母亲受教育程度	0.5780***	0.5794***	0.5757***	0.4572***	0.5189***	0.5313***	0.5627***
配偶父亲受教育程度	0.3879***	0.4384***	0.3384***	0.3196***	0.2631***	0.3249***	0.3307***
配偶母亲受教育程度	0.3540***	0.3935***	0.3160***	0.1394***	0.2054***	0.3149***	0.2732***
自己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							
配偶父亲受教育程度	0.3613***	0.3953***	0.3283***	0.0891*	0.2931***	0.2762***	0.2913***
配偶母亲受教育程度	0.4443***	0.4689***	0.4204***	0.1500***	0.3432***	0.3585***	0.3713***
配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							
配偶母亲受教育程度	0.6356***	0.6453***	0.6267***	0.3849***	0.5317***	0.6146***	0.6190***

注:(1) 双尾检验:\*\*\*  $P \leq 0.001$ ; \*\*  $P \leq 0.01$ ; \*  $P \leq 0.05$ 。(2) 控制变量为“14岁时自己的居住地”、“自己的户口”。

同样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并取得较高“文凭”。而自己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会通过择偶渠道提升子女配偶的受教育程度。

第五,“文化大革命”微弱地影响了教育阶层内婚制的延续。考察以结婚年度划分的表1数据的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列,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主要影响的是代际之间受教育程度的传承,而对夫妇之间阶层内婚制状况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同一代内的婚姻关系中,自己与配偶之间的教育阶层相关性就表现着越来越强的态势,净相关系数从“文化大革命”前的0.3544依次上升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0.3697,改革初期的0.4491和改革中期的0.6064。而自己的父亲与自己母亲、配偶父亲与配偶母亲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净相关系数,也具有同样的趋势。但是代际之间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净相关系数,则有所波动,即自己与自己的父母之间、配偶与配偶的父母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净相关系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一个低谷,因为“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后相应的数值都比“文化大革命”时要高。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人的教育传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大学本科生持续6年的停招、研究生连续12年的停招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了子女对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代际继承。但这种影响并没有打乱教育阶层得以维持的内在结构,因为代际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净相关系数不仅是正向的,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统计推断意义(在1%的水平上显著)。

#### 四、职业阶层内婚制的历史延续

在考察职业阶层内婚制状况时,笔者使用的变量是:“自己初职职业地位”、“自己初职时父亲职业地位”、“自己初职时母亲职业地位”、“自己结婚时配偶职业地位”、“自己结婚时配偶父亲职业地位”和“自己结婚时母亲职业地位”。因为在社会时间表上,这几个变量都与自己的初婚时间关系密切。绝大多数人都是先参加工作后结婚。自己初次参加工作时的社会地位,往往对于自己的择偶标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如果这些变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则在被访问者与各有关对象之间可以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即当自己的职业地位比较高时,自己配偶、自己父母、配偶父母的职业地位也会比较高;当自己的职业地位比较低时,自己配偶、自己父母、配偶父母的职业地位也会比较低。这就是说,在正相关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在这样一个由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所构架的网络体系中,人们的职业地位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即这些人的职业地位基本相同,或职业地位基本临近。即使存在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通婚状况,婚姻流动的等级也属于近距离而不是远距离。比如,在丈夫的职业地位处于官员阶层时,妻子的职业地位会处于官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或办公室工作人员阶层,而很少会出现妻子的职业地位在体力制造业工人和种植粮农阶层的情况。但当这些人员的职业地位具有反相关关系时,则说明丈夫的职业地位越高,则妻子的职业地位就越低,即当丈夫的职业地位为政府官员时,妻子的职业地位会是粮农或体力工人,反之亦然。

表2详细报告了各相关人员职业阶层之间的净相关关系。表2中除极少数数字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外,绝大多数数字不但显示着极其显著的统计相关性,而且还显示着正相关性,即不仅存在同一家庭内的各个人员处于同一或临近职业阶层的状况,而且还存在血缘家庭与姻缘家庭之间各个成员也处于同一或临近职业阶层的状况。不管是分性别被访问者之间的净相关系数,还是以不同结婚时段划分的被访问者之间的净相关系数,都反映着这一态势。

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

第一,表2中各对婚姻关系之间的净相关系数都较之与其他人员之间的净相关系数为高,这说明婚姻对方之间的职业阶层更加相同或更加临近。从表2中可以看出,自己与配偶之间、自己父母之间、配偶父母之间职业阶层的净相关系数都高于这些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净相关系数。如果说自己与配偶

表 2 各相关人员职业阶层之间的净相关系数(分性别、分结婚年度)

	全部 N=1179	男性 N=687	女性 N=487	1940~1965 N=129	1966~1976 N=209	1977~1991 N=582	1992~2001 N=241
结婚时配偶职业阶层与							
自己初职职业阶层	0.3139***	0.3459***	0.3888***	0.3521***	0.1675**	0.3141***	0.4047***
自己初职时父职业阶层	0.2120***	0.2416***	0.1872***	0.2052**	0.2283***	0.1914***	0.2616***
自己初职时母职业阶层	0.2031***	0.2280***	0.1810***	0.2388***	0.1765***	0.2060***	0.2049***
结婚时配偶父职业阶层	0.2929***	0.3697***	0.2353***	0.1711*	0.1663**	0.3451***	0.3257***
结婚时配偶母职业阶层	0.2702***	0.3552***	0.2094***	0.1800***	0.2816***	0.2826***	0.3067***
自己初职职业阶层与							
自己初职时父职业阶层	0.2020***	0.2268***	0.1748***	0.3049***	0.1627**	0.1612***	0.3018***
自己初职时母职业阶层	0.1084***	0.0692*	0.1747***	0.2409***	0.0517	0.0720	0.1844***
结婚时配偶父职业阶层	0.1571***	0.1426***	0.1831***	0.2008**	0.0733	0.1439***	0.2514***
结婚时配偶母职业阶层	0.1220***	0.1241***	0.1355***	0.0951	0.1506**	0.1193***	0.1574*
自己初职时父职业阶层与							
自己初职时母职业阶层	0.4455***	0.4253***	0.4780***	0.6831***	0.2401***	0.3526***	0.5814***
结婚时配偶父职业阶层	0.2757***	0.3087***	0.2307***	0.4554***	0.1155*	0.2373***	0.3065***
结婚时配偶母职业阶层	0.1661***	0.1973***	0.1355***	0.3659***	-0.0316	0.0984**	0.2572***
自己初职时母职业阶层与							
结婚时配偶父职业阶层	0.2322***	0.2656***	0.1930***	0.4331***	0.0454	0.1780***	0.2723***
结婚时配偶母职业阶层	0.2798***	0.3385***	0.2212***	0.4307***	0.0929	0.2572***	0.2755***
结婚时配偶父职业阶层与							
结婚时配偶母职业阶层	0.6416***	0.6487***	0.6417***	0.7809***	0.6796***	0.5549***	0.7303***

注:同表 1。

之间阶层地位相同或相近,意味着刚刚结婚的夫妇之间存在阶层内婚制状况的话,那么,父母和配偶父母职业阶层地位的高相关性,则说明在可以观察的各个历史时段中,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职业阶层基本在同一方向上发展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存在的话,即当丈夫的职业阶层地位升高的时候,妻子的职业地位也可能会升高。这一方面可能导源于择偶过程中的“竞争”,另外一方面也导源于关系资本的运用,因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单位制”的盛行时期,夫妻一方地位的上升,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包括裙带关系)带动另外一方社会地位的上升。

第二,自己父母与配偶父母职业阶层之间的净相关系数也很显著。这可以对两个家庭(自己与自己配偶出生的家庭)之间的阶层相同性和相似性做出统计推断。因为正相关系数同样说明:自己父母职业阶层地位高的时候,自己配偶父母的职业阶层地位同样也比较高;自己父母社会地位低时,配偶父母社会地位也同样比较低。这是阶层内婚制现象存在的最好证明。

第三,自己与自己父母之间具有正的职业阶层地位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说明着阶层的承传性,父母可以将自己的职业阶层优势,借助于各种渠道,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子女也可以借助于各种渠道,继承父母的阶层地位优势。同样,父母的阶层地位劣势,也会承传给给自己的子女,尽管子女并不想承接这种来自于上一辈的劣势。可是,谁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呢?因而,虽然大家都想在社会地位等级上由低向高流动,但缺少支持与具有社会支持的流动,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第四,自己与配偶父母职业地位之间具有正相关性。父母的职业地位比较高时,会在言传身教中对子女形成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型塑子女的择偶形象。所以,自己与配偶父母职业阶层地位的正相关性,一方面说明配偶父母对配偶的择偶标准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表现着阶层内婚制思想对下一代人的作用。

第五,从以结婚年度为基准的不同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制度对阶层内婚制的不同影响。比较表2数据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列的净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结婚时配偶职业阶层”与“自己初职职业阶层”之间的净相关系数都是显著的,具有统计推断意义,但相关系数值却存在着波动。在“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数值为0.3521;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降低到了0.1675;在改革初期,自己与配偶之间的社会阶层相关性,就增长到了0.3141;而在改革中期阶段,伴随中国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数值就增长到了0.4047。

无疑,“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阶层内婚制,但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结婚的那些夫妇的

职业阶层相关系数的显著性上可以判定,这种影响是微弱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到调查时为止,自己与配偶职业阶层地位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增强(见表3)。

表3 各相关人员职业阶层之间现在的净相关系数(N=1169)

	配偶现职	自己现职	父亲现职	母亲现职	偶父现职
自己现职	0.4082***				
父亲现职	0.2132***	0.2173***			
母亲现职	0.1482***	0.1246***	0.4137***		
偶父现职	0.2041***	0.1630***	0.2187***	0.1889***	
偶母现职	0.1743***	0.1299***	0.1460***	0.2214***	0.6069***

注:同表1。

## 五、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变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政策的落实,包办婚姻的消除,都没有改变中国的阶层内婚制状况。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二公”时期,阶层内婚制也普遍存在。如果说大家都以爱情为基础结婚,那么,爱情就是“有阶级性”的。正因为阶层内婚制仍然存在,所以,在婚姻缔结过程中,非爱情因素比如说社会地位、财富和收入、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等等,仍然是婚姻当事人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表面看起来,婚姻体现的是婚姻当事人个人之间的生理结合,但在本质上却体现着男女两性在社会地位上的结合。

第二,国家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地位评价准则,对个人的婚姻择偶行为具有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致使考量阶层内婚制的两个主要变量的净相关系数都发生了波动。该系数波动的低谷之所以没有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而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制度的干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并没有将阶级出身作为是否可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择录标准,那些在建国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可以将自己优越的阶级地位,通过教育传承给自己的子女。统计表明,直到1956年9月,大多数大学生仍然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家庭;在高等学校本科在校学生中,只有34.2%的人出身于工农;在包括中科院系统在内的在读研究生中,只有23.4%的人出身于工农(李强等,1999:156;费正清,2000:346)。虽然“反右”扩大化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处于不利位置,可是大学考试制度仍然实行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双轨制度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精英教育使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形成等级,平民教育使全民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得到提高并易于贯彻政府的政治理念。所以,那些注重教育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的子女,仍然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前得到较多的机会,流动到社会的上层。因此,“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结构与阶级阶层利益获取状况,并没有因为新政权的影响而致使大规模跨阶层婚姻流动。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招生体制被废除,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开始实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失去了被推荐的资格;那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也随父母的下放劳动迁移到了农村;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政策指引下在农村安家落户;家庭出身成为社会地位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某些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才以与贫雇农家庭或工人家庭联姻的方式寻找政治庇护所。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教育阶



层的内婚制状况和职业阶层的内婚制状况才被影响,尽管社会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竭力避免不利政策对自己终身婚姻的负面影响,但有人还是落入了政策制度的框限。而一旦这样的制度外围在1977年被消除,社会个体的婚姻决策,就马上回归到阶层内婚制上来。于是,净相关系数在1977年之后渐次回升。

第三,阶层内婚制的维系和延展状况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后,阶层内联姻的趋势越来越强,因为1992年以后的净相关系数,都比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要高出很多。伴随收入差距的拉大与中国社会阶层的多元化,阶层内婚制状况将越来越显著。家族制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使家族之间为建构易于自己竞争的市场环境而滋生联姻策略。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居住房屋类型的区域性特色,也将富人与城市里的其他群体区别开来,这更加便利了同类型人们的交往,并在阶层生活格调的趋同里制造着阶层内婚制环境。后“单位制”时代的遗产,即各个不同单位的家属院,也基本上把同类型人们集中在一起居住与生活;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的学校收费制度,更为阶层内婚制创造着交往的途径。重点大学与著名高校中,农民阶级出身的学生人数减少了,但干部家庭出身和业主家庭出身的子女则增加了;在师范院校和农林院校中,农民阶级和城市中层家庭的孩子占了多数。这都为阶层内婚制在将来的增长提供着社会支持。所以说,阶层内婚制不仅在现在流行,而且在未来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将持续存在。

第四,家庭出身或父母社会地位的高低,对子女的婚姻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一方面表现在父母对子女的职业和教育传承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婚姻的阶层稳定性上。因而,人的出身对其未来的婚姻,具有非同小可的轨迹性和路径性依赖。反过来,阶层内婚制的维持,又对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起着固化作用。同一个阶级的人们,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构建自己独特的情调、消费同样的时尚,并向某一个为本阶层逐渐认同的环境集中居住,而且在婚姻选择中,维护本阶层的那种联姻通道,这一切都增加我们社会的阶级阶层“壁垒”。虽然教育在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处打开了一扇向上爬行的“窗扉”,但这个“窗扉”倘若得不到政府的有效维护,保证其公正公平地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机遇,那么,阶级阶层之间的不理解就可能增加,为争取本阶层利益而滋生的矛盾就可能凸现。

#### 参考文献:

1. 马克·赫特尔(1988):《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浙江人民出版社。
2. 郭松义(2000):《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
3. 刘英主编(1987):《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林南、边燕杰(2002):《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载于边燕杰等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3~115页。
5. Blau, Pet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6. Goldthorpe, J. H.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Whyte, Martin King (1993), Wedding Behavior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Chengdu, in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edited by Deborah Davis, Stevan Harr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 Wright, E. O.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责任编辑: 朱 犁)